

黃金川的情感世界與現實關懷 ——以《金川詩草》為中心

黃俊傑

- 一、前言
- 二、日據時代台灣詩學概況
- 三、金川詩學中的情感世界
- 四、金川詩學中的現實關懷
- 五、結論

一、前言

黃金川（一九〇七、十一、五～一九九〇、十、八）女史是南台灣文學史上居一席之地的詩人，她的《金川詩草》及其續篇（合刊為《金川詩草》，一九九一，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出版）收錄一生詩作三五九首，數量雖非龐大，但情感細膩，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對現實的關懷，誠為台灣文學史上值得探討的一章。這篇論文寫作的目的，就是在於分析黃金川詩學世界中的情感內涵與詩作中所反映的現實關懷。孟子（三七一～二八九B.C.？）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八》），為了對這一位吾鄉女史有比較貼切的了解，我想本「知人論世」之宗旨，本文第一節先介紹黃金川其人及其家世，接著在本文第二節縱觀日

據時代台灣詩學發展的一般狀況，兼及黃金川的業師施梅樵（一八七〇～一九四九）先生，以作為探討黃金川詩作的歷史背景；本文第三節分析黃金川詩作中感懷、思親、酬友等詩作中所展現的情感世界；第四節則扣緊台南與高雄的歷史背景，探索黃金川若干詩作中的現實關懷。最後一節則就以上的分析，提出若干結論性的看法。

黃金川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生於臺南縣鹽水港的富裕之家，父親黃宗海在她周歲時就與世長辭，母親蔡寅雅好文學，黃金川自幼深受母親的啟迪，對詩詞頗為喜好。少女時代隨其兄黃朝琴（一八九七～一九七二）負笈日本東京，進入精華高等女校求學，十八歲高中畢業後返回臺南故鄉。二三歲那一年與高雄陳啓清（一九〇四、一、十五～一九八九、九、三〇）結婚，長住高雄，相夫教子之餘，常從事文學創作，夙有「三台才女」之稱，留下可觀的作品。

在台灣南部發展史上，臺南與高雄以米糖之生產而在台灣經濟史上居於舉足輕重之地位。遠在十七、十八世紀，臺南平原就是臺南蔗糖重要的產地。台灣南部產糖區中所謂的「台灣府產區」北起北港南到安平，所謂「打狗產區」則北起茄萣南至恆春。⁽¹⁾高雄陳中和家族的興起，就是以南部地區的米糖生產為其背景。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陳中和離開順和棧，自創「和興行」，作為順和棧集團下的店號之一，順和棧集團並同壟斷了打狗、鳳山、阿缑地區米、糖的出口，當時有「新台灣」、「安平」、「打狗」三艘大帆船往來安平、打狗之間轉運米、糖的外銷，陳中和漸崛

(1) 參考：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七八），頁二九。

起為南台灣之殷南。一九〇〇年，陳中和創立台灣製糖會社，再創新興製糖。一九〇三年三月，並創辦「南興公司」於三塊厝（鹽埕區建國橋東邊），出任社長。黃金川夫婿陳啓清與其他兄弟啓貞、啓南、啓峰、啓川、啓琛共同擔任南興公司之取締役（董事）。陳啓清亦擔任家族產業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的董事。⁽²⁾ 黃金川嫁入陳家時，正值陳氏家族事業日趨興旺的時期。這是黃金川從事文學創作的家族史背景。但是，黃金川的文學創作，尚有整個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蓬勃發展，作為她的憑藉，所以，我們接著分析日據時代台灣詩壇的狀況。

二、日據時代台灣詩學概況

台灣詩學的發展，起於清代。當時因為詩社的盛行，曾使文風盛極一時，清代台灣詩學的狀況，絕不比內地遜色。根據連橫〈台灣詩社記〉及《台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文學家並不因日本的統治，而減少以漢文從事文學創作的行動。當時詩社的數目曾多達一百七十八社。⁽³⁾ 造成日據時代台灣詩學興盛的原因甚多，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清代文風的遺緒：自清政府領台以來，由於社會安定，來台拓墾的人士漸增，文風亦因此為之勃興。再加上科考中「

(2) 參考：戚寶村，《苓仔寮至大港都—高雄陳家的歷史》（未刊稿本），第三章：「中和時代」。

(3) 參考：廖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二十一。

詩」是一個重要的部份，因此，賦「詩」成為當時重要的文學活動，詩社之成立如雨後之春筍，其中較著名者如沈充文的「東吟社」，林高全的「鐘毓詩社」，鄭用錫的「竹社」，林占梅的「梅社」、「潛園吟社」，唐景崧的「斐亭吟會」、「牡丹詩社」等，在在說明當時文學的盛況。可見乙未割台日人佔據台灣之後，政權遞遷雖然如清末陳季同的詩所說：「台陽非復舊衣冠，從此威儀失漢官」，但是台灣詩學之遺緒並未隨異族入侵而中斷。

第二、日人的刻意提倡：日人自佔領台灣之後，為求穩定當時的社會秩序，除有高壓強制的手段之外，日人亦採取懷柔政策，就是籠絡當時社會意見領袖的知識分子，如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年，總督桂太郎就曾有「頒發紳章制度」的擬議，其內容為：⁽⁴⁾

本島人民今日之境遇，不論賢愚良否，概未享得相當之待遇，甚至具有一定之見識或資望者，尚且須與愚夫愚民為伍，實不忍睹。如斯，實不獨非待良民之道，復於島民之撫育上關係不尠。因此，茲特創設優遇具有學識資望者之途，俾能均霑皇化，惟此乃最必要之事也。

日本殖民當局不僅尊重當時的知識份子，更著力籠絡文人學士，所以在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在台北的淡水館就有一個文人學士的聚會「揚文會」。當時的總督兒玉源太郎就曾親臨致辭，以示籠絡。

第三、家國傷痛之情，昇華而為文學作品：文學的創作其中有最主要的特質，那就是「情感」的宣洩。所以《詩大序》就說

(4) 據王詩琅，〈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所引。收入：氏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衆文圖書公司，一九八〇)，頁十七。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⁵⁾以上這段話說明了一個文學活動的完成，是必須以情感爲出發點的。從另一面來看，我們可以說當我們心中有情緒產生時（不管是歡樂或悲傷），若要使這個情緒得以暢通的話，將它提昇至文學作品，也是一個很好的舒解方式。並且由於情感的真實流露，作品更易臻於較高的藝術境界，所以情感與文學的創作是有密切的關係。

由此看來，一個人遭逢家國變化之時，心中所興起的黍離之悲，正是文學創作的最佳泉源。因爲人類經營群體的生活，當其所歸屬的群體被毀去時，本屬其群體的成員，其心中所興起的失落、茫然、悲憤、淒切之情，必然充塞在其心中。生性更爲敏銳的文學創作者，對大時代的變局，其胸中的抑鬱更是逾乎常人。在這種情形下，文學的創作就成爲澆愁的良藥了。如當時的台籍文人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在其〈離台詩〉中所表現的孤憤之情，閱之不禁令人扼腕，詩云：⁽⁶⁾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鷗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總結以上三點原因，最值得我們重視的當屬二、三兩點原因。因爲就第二點而言，雖然日人努力地籠絡士人，甚至對於詩社、詩會的活動也刻意提倡，但這種態度的背後所包藏的禍心實爲人人

(5) 《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重刊宋本毛詩註疏附校勘記），頁十三。

(6) 見：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頁四一六。

所共見。因為日人支持詩社的背後動機，只是為了其統治的方便，使台籍的知識份子感激日人的寬容，進一步地認同此一外來的政權，因此常在鼓勵的當時，也同時對有民族思想的詩作進行取締的工作。並且日本人為了使台籍知識份子逐漸棄絕「漢文」的創作，乃對當時的書院加以破壞，⁽⁷⁾ 期使民族精神之所聚的書院，無復賡續前人的文化命脈。更有進者，則禁止報刊、雜誌使用中文，尤其是在一九三七（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更是下達了全面禁用漢文的命令（除詩社聯吟外）。面對此一困局，許多詩作只好轉為吟詠山水，怡情養性，不敢透露絲毫民族思想。黃春潮在其〈龍峒詠〉一詩的自注中，就曾說：⁽⁸⁾

日本人欲滅我國文字，先令廢止漢文日刊報紙，繼則嚴重
取締設帳徒者，不准宣揚國學，當是時寒士之欲得一噉飯
處，則非拋棄詩書，徑學日文日語不可，以故公子王孫之
流而為耕織者，到處皆是，亦時勢使然也。

但即使環境如此惡劣，當時台灣詩人的詩作之中蘊涵著故國之思的詩作，依然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詩人的風骨也在此時，展露其高潔的品格。我們接著試就金川女史的老師——施梅樵（一八七〇～一九四九）先生，作一探討，觀察時人的風範，兼以說明金川女史所受的影響。

施梅樵，字天鶴，一生的別號凡歷三變，「雪哥」為早期使

(7) 參考：許俊雅，《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收入：《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號，頁九八一～九八三。

(8) 參考：黃水沛，〈大龍峒小志〉，刊於《台北文物》第二卷第二期。《台北市志》（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校，一九六二）卷十，〈雜錄〉〈文徵篇〉亦收此詩，頁四八。

用，「蛻奴」則用於中年，晚歲則更號「可白」。這三個別號的取捨，其中二個代表了施先生一生與日人不妥協的最佳證言。「蛻奴」意指去倭奴之恥；「可白」則表示對台灣光復的喜悅，心情之可表白。⁽⁹⁾因此，從別號的使用，已經明顯地暗喻施梅樵先生的不妥協性格。

在日人據台之後，施先生曾避於福建晉江，但後來為了侍奉祖母，又回到台灣，並與洪棄生等人創立詩社，相互唱吟，其詩多寓家國之思，充分表現當時知識份子的心情，如〈六十初度放歌述懷〉⁽¹⁰⁾所言：

我欲乘舟西向入黃河，河流九曲生層波，
有時蛟龍或起立，聽我橫槊高嘯而狂歌；
我欲一入商山采紫芝，四皓物化已多時，
琴書几席空陳跡，室邇人遠徒奔馳；
我欲依傍浣花一結屋，草堂之外千章木，
及今家世幾遷移，何處得搜遺篇讀？
我欲杖頭掛錢日沽酒，新豐市上尋屠狗，
委巷壯士氣激昂，欲談時事爲掩口；
我欲月下橫琴歌樂府，一時眠鶴齊起舞，
盛世元音久不聞，一彈再鼓淚如雨；
我生記在同治庚午年，又逢劫後之乙巳，
酸辛世味已備嘗，滄海種桑經熟視，

(9) 參考：施梅樵，《鹿江集》（彰化：瑞明書局印，未著出版年月），〈施公梅樵家傳〉，無頁碼。

(10) 見：施梅樵，《鹿江集》古詩部（六十初度放歌述懷），頁八～頁九。

無成功業半白頭，徒博虛名雕蟲技，
 甲子干支歷已周，不富不貴俗兒鄙，
 生成傲骨自嶙峋，未敢徇人以枉己，
 媚蛉蜾蠃半人間，傾家沽名驕鄉里，
 旁人爭笑沐猴冠，覩然面目不知恥，
 妒忌還多婦女心，只好大言欺孺子，
 我與若輩久割席，防欲穢氣汚杖履，
 老夫嫉惡本如讎，詎以乞憐日搖尾，
 懲一儆百其素懷，斧鉞尤須資野史，

這首詩充分表現了在政權轉移中，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世事的憤激（「委巷壯士氣激昂，欲談時事為掩口」）與悲愁（「盛世元音久不聞，一彈再鼓淚如雨」），實在是時代創傷人的心靈縮影。

在梅樵先生過世前，亦曾吐露作為時代夾縫心的心聲，字字令人長嘆，其言曰：⁽¹¹⁾

余生不逢辰，湧經禍亂，歷劫滄桑，為珠崖之棄民，作東晉之僉父，半籌莫展，一事無成，生平心血，僅留數卷詩歌。所謂不能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而只載之空言，其即此意乎？爾等不可不為余傳，使祖宗知余遭時不遇，非余之不肖也。

我們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梅樵先生的行事，與異族統治台灣的政權，是義不兩立的。但由於處於當時日人的高壓政策之下，所以不敢言高論，只好將滿腔的悲憤，寄寓於詩文之中，所以到了彌留之時，只好嘆謂「生平心血，僅留數卷詩歌」。

(11) 參考：施梅樵，《鹿江集編後語》，無頁碼。

其實像施梅樵先生這種時代夾縫人的心靈創傷，正是日據時代台籍知識份子的一個共同現象，這也正是我們在探討「詩社」數目之所以增加原因中的第三項原因，可加以解釋的。因為在心情鬱結，而又不得訴諸行動予以反抗時，文學作品正是最好表明心跡的媒介。而由於發抒於文字，如果下筆不慎，極易引來殺身之禍，結果意義濃度與密度深邃的詩，就成為文人吐心聲的利器了。

為說明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再以連雅堂序《櫟社沿革志略》的一些話，窺探其時詩人的心志：⁽¹²⁾

櫟社既設之二十載，樹碑菜園；又集同人之詩而刊之，將以示諸後。嗟乎！櫟為無用之材也，詩亦無用而眷眷於此者何也？文運之盛衰，人物之消長，朋簪之聚散，道義之隆污，均於是在；何可以其無用也而棄之！先是，戊戌（清光緒二十四年）之歲林子癡仙始倡是社，和者十數人。越七載，余居大墩，邀入社。余固無用之材也，幸而得從諸君子後以扶持風雅，則余何敢以不材也而自棄。海桑以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逃於詩，以寫其侘傺無聊之感。……文運之存，賴以一線；人物之蔚，炳於一時。詩雖無用而亦有用之日，莘莘學子又何可以其不材也而共棄！

從連雅堂的這篇文字看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時期，本省詩人的苦悶，實在是促成「詩社」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見：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六三）。

三、金川詩學中的情感世界

黃金川女史生於動亂的時代，早歲曾赴日本留學，但流動在她身上的民族血脉，並未因接受日本教育而中斷；相反地卻更造成她對國家感懷的深刻之情。尤其是當她將這些情感形諸文字時，讀者莫不可由其中讀出深沈的故國之思。此外，黃金川師事施梅樵，梅樵先生的風骨必對她產生人格上的影響。

關於黃金川與施梅樵的師生關係，我們從其〈壽施梅樵老夫子六秩令旦〉的四首詩中，便可窺知其端倪：⁽¹³⁾

梅花初綻值佳辰，甲子平頭歲又新。
孤島詩傳雙管擅，五雲瑞擁一家春。
溪山嘯傲吟軀健，松菊招尋梓里親。
海內如公知有幾，魯靈光殿見來真。
春風絳帳記傳經，立雪門前仰典型。 - 其一
酒泛蟠筵千斗綠，篋存前代一衿青。
縱橫才藻收河嶽，灑脫詩篇寫性靈。
今夕閨中瞻北極，壽星朗朗耀文星。 - 其二
物外逍遙是謫仙，生涯可可復然然。
南山酒熟傾花露，北海籌添記鶴年。
松柏耐寒顏久駐，文章有價手曾編。
放懷天地浮鷗似，四海爭將姓氏傳。 - 其三
閒雲野鶴任婆娑，滄海珊瑚盡網羅。

(13) 見：黃金川，《金川詩草》（台北：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一九九一），頁九三～頁九五。

靜裏放懷忘歲月，酒邊得句嘯山河。

銀鉤鐵畫毫尖健，玉粹金精妙緒多。

桃李成行來獻祝，筵前賡唱百年歌。·其四

在這四首律詩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黃金川對施梅樵深刻認識，因為詩中所刻劃的，正是一個清高自持、不與世俗同流的人格圖像。因此，黃金川對施梅樵的敬服，同樣的也在這四首詩中展露無遺。

從以上的敍述，我們可以看出黃金川在成長的過程中，時代的變局塑造了她，師友的人格風範亦影響了她，在這雙重的影響，以及她個人敏銳觀察力的主導下，她的詩作中所呈現出的情感世界就更為多樣，甚至複雜了。以下我們將試以《金川詩草》中的作品作為分析對象，進一步剖析其情感世界。

任何成功的文學活動都必須包括有三個基本的要素，即作者、作品、讀者。其中讀者必須藉由作品方能感知作者內心的底蘊，而作者也唯有因著作品的完成，才能宣洩胸中的塊壘，因此作品乃成為文學活動中，讀者與作者的意義創造場，當然這其中的作者之「創造」與讀者的「再創造」的循環詮解過程是不相同的，不過也因為如此，作品本身的意義方能產生各種不同的樣態。

然而具備有這三樣要素，並不必然保證此一文學活動是有價值的，因為作品可分好與壞，好的作品可使文學活動更添光彩，可是不好的作品卻會破壞一個完整的文學活動，因此好作品才是判定循環詮釋過程是否成功的必要條件。然則好作品的標準，如何界定呢？我想其中的關鍵點就在於「感情」了。因為「感情」是文學作品的生命，一篇沒有生命的作品，即使其文學雕琢得美妙華麗，讀之卻會如同「七寶樓台，拆碎下來，不成片段」，這

就是劉彥和在《文心雕龍，麗辭》中所說：「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¹⁴⁾

有生命的作品則不同，因為篇中的文字，字字帶有作者的情感，生命不可斷，情感不能廢，所以古人才說：「詩言志」，此處的「志」就是「情感」。黃金川的作品也正因為蘊涵誠摯的情感，所以常能勾出讀者情感深處的幽邃，使讀者能達到與作者情感交融（共鳴）的境界，甚或更進一步使讀者在宣洩情感的剎那，擺脫客體世界的糾纏，進至純美的「和諧」之中，此正如佛家者言「以空慧水，淘洗情執」。

一般說來，舊時女子而有才者，常因生活範圍的局限，情感趨於細密精緻，因此在創作詩作時，其所選擇的題材常以詠物為主，即使才高如易安者，亦不能免俗。黃金川的詩作自不免於此中用心。但是，黃金川的作品卻不像一般香奩體的詩作，充滿著濃膩的脂粉氣，令人讀之興趣索然；反而是迎面一股清新之氣，洗卻鉛華，予人輕靈爽朗的感受，如其〈嶺上梅〉⁽¹⁵⁾一詩云：

開傍黃雲十月時，幾疑微雪染寒枝；
是誰漏洩東風信，春到人間獨早知。

此詩運用時間的壓力，將冬、春兩季壓縮為一，並將此種時間長度擠縮到微小的空間（枝頭），使得這個微小的方寸之間，意義的張力突然增加，讓讀者誦讀之際感受極深。此外在〈曉山〉⁽¹⁶⁾一詩中，亦可見到她風格卓立的詩風，「珠簾高捲千峰起，青入樓

(14)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一九六七），卷七，頁三四。

(15)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四一。

(16)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四四。

頭帶曉寒」，此詩亦是運用空間的感受，讓尺寸之際，剎那之間氣勢磅礴。因此，其詠物詩實能脫前人的氣習，展現不同的風貌。

在黃金川的詩作中，最能引人共鳴的，要數「感懷」、「酬友」、「兄長」、「思親」方面的作品。因為從其中我們可以窺知一個高潔靈魂的風骨，其情感是如此的深切，如此的細緻，以至令人無法不將封藏在歲月記憶中的情感挑出，一一與其呼應。如其〈接繡絨女士來信有感寄懷〉⁽¹⁷⁾一詩：

多君別後寄書頻，無限離愁見性真。

休嘆異鄉知己少，故園仍有素心人。—其一

讀罷來書淚欲垂，千金難買是兒時；

此言豈是尋常語，除卻愁人總不知。—其二

這兩首詩使我們認識到「情誼」是可貴，不因空間的阻隔，或是時間的消逝而薄弱化，反而是在斯人獨憔悴之時，知心人正伴著永恆的記憶期待著每一次的重逢。在〈酬答淑卿女士〉⁽¹⁸⁾詩中，詩人勉人亦自勉地說：「莫漫臨風哭當歌，靜神養氣自寬和」。

另外，在〈感作〉⁽¹⁹⁾詩中，黃金川表現出另一種情感的方向

豈盡才人命不濟，故園回首隔雲泥；

世間無限傷心事，偏與詩人作話題。—其一

愧乏生花筆一枝，寫將心事付新詩；

(17)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一〇七。

(18)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一一〇。

(19)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百十一～百十二。

可憐點點黃花淚，灑向西風只自知。 - 其二

近江樓閣強登臨，恩怨難消是此心；

目斷苓洲秋水外，可知精衛是冤禽。 - 其三

落木西風瑟瑟秋，故園遙望白雲悠；

多情惟有樓前水，解送離心向北流。 - 其四

從這四首詩中，我們發現黃金川感受到人生恩怨的糾結，或對時代的變化，感悟人力的無奈，從而拈出客觀限制的人生格局，使讀者在誦讀的過程中，藉由種種情緒的流洩，使內心經由共鳴而獲得安慰，從而刺激讀者再次面對人生的勇氣。

我們在前文曾提及黃金川雖受日文教育，但她的詩作中卻洋溢著民族情感。除前引〈感作〉中所透露的民族情感之外，在〈愁感〉⁽²⁰⁾一詩中的情感正與其師施梅樵前後呼應：

西風忽地入華堂，回首韶華九月將，

千里夢魂還故國，幾分愁病滯他鄉；

誰家玉笛吹殘暑，到處金英綻早涼，

觸我吟情禁不得，那堪又聽搗衣忙。

此詩就充分地表現了黃金川對故國的緬懷，這實在是當時詩人的共同心聲。

復次，在其「兄長」、「思親」的詩作中，也表現出百死千難而不悔的手足情與孝親之思。我們試觀〈喜朝琴胞兄還鄉〉⁽²¹⁾詩中言：「古來手足知多少，愛我如兄有幾人」，由此可知兄妹之情之真摯，而在「十年愁覺百年同，乍晤無言眼自紅，握手莫

(20)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三五。

(21)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百二十二。

疑消瘦甚，驚心總在炸轟中」，⁽²²⁾使我們看到亂世中最可貴的手足之愛。另外在其〈寄親〉⁽²³⁾詩中，由其「江樓明月滿，應照不眠人」二句中，我們可以見到一位在月圓之夜，思親難寐的人，正輾轉反側，孺慕之情溢於言表。

金川女史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在她光復前所賦的〈夜思親〉⁽²⁴⁾一詩，最能流露她的真情，詩云：

夜夜思親兮，指暗彈。不成寐兮，漏聲殘。
曾幾何時兮，春欲闌。月明如水兮，不忍看。
路程遠遙兮，魂飛難。思親淚兮，永難乾。

這首詩是金川女士身在高雄，思念遠在臺南鹽水故鄉的母親而作，字裡行間，鄉情親思一湧而出，使讀者深受感動。

總之，在《金川詩草》及婚後所作的詩中，所展露的是情感深切的藝術境界。這正是由於她的持志高潔，因此品格便流露於其筆端。她的〈寄籬邊故人〉⁽²⁵⁾詩云：「每於雪後見天真，淪落人間不染塵，一種清高誰比擬，也應明月是前身」。這首詩最可以顯示金川女史志行之芳潔與人格之高雅。如前人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金川女史的詩中，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玉潔冰心的節操。

(22)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一百二十一。

(23)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一百零一。

(24)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九九。

(25)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七四。

四、金川詩學中的現實關懷

現在，我們再換一個角度，觀察黃金川詩作中所透露的她對現實世界的關懷。這種關懷也可以部份地反映台灣詩學傳統以「竹枝詞」為代表所展現的現實主義的精神。《金川詩草》中一首〈震災行〉⁽²⁶⁾，以歌行體描摹一九二七年的那場災難，透露出人的關懷，也因而使其詩脫出個人情感宣洩，擁抱廣大人民的苦難。其詩云：

歲在丁卯七月秋，星斗滿天月似鉤，
 無端半夜天災起，驚動家家幽夢裡，
 朱戶柴門啓不開，越牆穿窗急倒屣，
 倉皇呼籲竟無門，頃刻一家判生死，
 山川震動似雷鳴，地轉天翻實可驚，
 消盡電燈成黑獄，嘈嘈耳邊呼喚聲，
 天色欲明偏不明，此時一刻似一更，
 不知震動還多少，眠庭枕草何時了，
 荒磚破瓦亂成堆，財散人亡劇可哀，
 樂土傷心遭惡劫，蒼生元氣何時恢。

〈震災行〉這首詩所寫的一九二七年(日本昭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發生在黃金川的故鄉台南鹽水的大地震，這次大地震發生在當天凌晨二時十分，為時四十秒，震源在距臺南市十四、五哩，以新營郡下之鹽水街受害最烈，其次為高雄、嘉義、台中，北部地區為弱震，彰化未受影響；鹽水街總戶數一四〇〇戶中，半數以上

(26)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五二～五三。

受到地震的破壞極為嚴重。⁽²⁷⁾ 地震發生後，台灣各地公私機關立刻展開救災，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台中台南新聞社、台南新報社展開全島募集救濟金的活動，每人勸募五十錢以上。⁽²⁸⁾ 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山上總督及代理祕書宮竹屋，也立刻在二十六日連夜南下高雄、臺南視察慰問。⁽²⁹⁾ 黃金川出身臺南鹽水，當時她在故鄉待字閨中，這次的震災對她而言是一次錐心之痛，她在詩中表露強烈的對民生疾苦的關懷。

我們如果將黃金川所描寫的這次地震，放在整個日據時代台灣震災史的歷史背景來看，就可以對這首詩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發現一九二七年並不是台灣地震次數頻繁的一年。在整個日據時代，地震最多的年份是一九二二年六次，其次是一九三五年發生五次，再其次是一九〇六及一九三三年的四次。總計在有地震記錄的四十四年之中，地震有五十三次，而沒有地震的年份則有：一九〇二、一九〇三、一九〇七、一九一一、一九一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一九二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一九三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四〇，以及一九四二年，總共有十八年沒有足資記錄的地震，在整個時期當中，約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年份無較大的地震。⁽³⁰⁾ 其次，

(27) 見：《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一版。

(28) 見：《台灣日日新報》（夕刊），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四版。

(29) 見：《台灣日日新報》（夕刊），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四版。

(30) 見：黃俊傑、古偉瀛，《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防災與救災措施的分析（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防災科技研究報告七九—〇五號，計劃編號：NSC 79--0414--P002--19B），頁四七。

就地震發生的地點來看，在整個日據時代，宜蘭及花蓮有十一次，合佔所有次數的百分之四十點六，其次是台南（六次），再其次則是雲林（五次），台中彰化及嘉義則各有四次。高雄、澎湖地區則未有較大之地震，而屏東的唯一一次是發生在海上（鵝鑾鼻東南海上）。⁽³¹⁾ 從以上統計來看，日據時代臺南地區的地震次數僅次於花蓮、宜蘭地區。復次，就地震所造成的災情來看，總計五十三次有紀錄的地震當中，死亡人數達五二二五人，其中最大的一次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發生在新竹台中地區的關刀山地震，該震死亡人數高達三二七六人，受傷者達一一二〇五三人；另外死亡人數超過千人以上的只有一次，是在一九〇六年發生於嘉義民雄的地震，死亡有一二五八人。平均每次死亡人數為九八點六人，其實在五十三次中，造成死亡的地震只有二十四次，而其中又有十五次死亡人數在十人以下。⁽³²⁾ 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臺南地震所造成的傷害記錄來看，這次的震災在臺南地區造成新營郡、新豐郡、曾文郡、嘉義郡、臺南市、北港郡等地住家全毀者共一五四戶，半毀者共一八七戶，損害較大者有四三六戶，損害較小者有四三五戶，非住家全毀一一八戶，半毀八十三戶，損害較大者有六十四戶，損害較小者有一九五戶，死亡二十二人，重傷輕傷共一三四人。⁽³³⁾

從以上的歷史記錄來看，黃金川所經歷的這一次臺南大地震，在規模上與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發生在新竹台中地區的大

(31) 同上註。

(32) 同上註。

(33) 看：《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夕刊），第一版。八月二十七日，第四版。

地震，不可同日而語，所造成的傷亡也有限，但是詩人敏銳的心靈，目睹「荒磚破瓦亂成堆，財散人亡劇可哀」的境狀，不免興起「樂士傷心遭惡劫，蒼生元氣何時恢」的感嘆。

再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黃金川詩學世界中的現實關懷，是深植於她的文學取向之中的，誠如她在〈詩癖〉⁽³⁴⁾中所賦：「吟哦氣勢愛堂皇，不看尋常豔體章，莫笑深閨偏執拗，措詞蘊藉見才長」，她「不看尋常豔體章」，她更關懷現實人生中的種種波折。舉例言之，金川女史在〈感作〉⁽³⁵⁾詩中有句云：

從來恩怨豈無端。一事難平百事難。

卻笑此生如傀儡。犧牲究竟爲誰安。—其二

劫後心寒膽亦寒。人生濁世萬重灘。

黃金漫說無邊力。恨海如天欲補難。—其三

這首詩中所反映的是對人生濁世的感傷。

對現實的關懷使黃金川詩作中常能反映當時的歷史情景。舉例言之，在《金川詩草》中就有兩首寫當時的農漁民生活的作品。在兩首題爲〈蠶婦〉的詩作中，黃金川這樣描繪蠶婦的辛勞：⁽³⁶⁾

桑原碌碌歎勞人。蠶飽蠶飢瘁此身。

且喜近來絲價好。一年家計不憂貧。—其一

年年忙碌養蠶晨。分繭抽絲耐苦辛。

環境自窮心自足。此生何羨綺羅人。—其二

在黃金川的筆下，桑下養蠶農婦的辛勞，躍然紙上。這首詩令人

(34)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五七。

(35)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百十六～一七。

(36)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七八。

想起《詩經·幽風·七月》⁽³⁷⁾這首詩中，詩人歌詠農家女在春季採桑的辛苦：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幾千年來，中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和文學工作者，對於農民的處境都深致同情，以作品刻劃農民的苦辛。黃金川的〈蠶婦〉詩也延續了這種傳統。此外《金川詩草》中的另一首題為〈鯤鯓漁火〉的五言詩，則描寫黃金川的故鄉台南南鯤鯓漁民深夜捕魚的情景：

螢火三更市，漁人八月舟；
光輝懸北嶼，燭爍亂東流；
點點明沙草，星星雜斗牛；
客來堪極目，晚上赤崁樓。

「點點明沙草，星星雜斗牛」固然景緻怡人，但是「螢火三更市，漁人八月舟」中卻藏有漁民無盡的苦辛。這大概是詩人落筆之際所要傳達的訊息。

在一九三〇年，黃金川在二十三歲時嫁到高雄為陳家媳婦，不免為思鄉所苦，例如〈元宵思鄉〉詩云：⁽³⁸⁾

輕寒向暖好元宵，閒坐樓頭感寂寥；
回首故園今夜月，萬千燈火映人潮。

(37) 屈萬里，《詩經釋義》（台北：華岡出版部，一九六七），頁一〇九。

(38)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六九～七〇。

(39)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一九。

高雄苓洲景緻與台南鹽水自是不同，在黃金川筆下，有這樣的描寫：⁽⁴⁰⁾

牧童歸去晚風和 十里平原漲綠波
自是苓州風景異 農人居比釣人多

從高雄地區的發展史來看，苓雅寮原來是由漁民定居而形成的聚落，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後逐漸發展成為市鎮。陳氏家族的落籍所在即為苓仔寮的頂寮附近，開台祖陳元（中和之曾祖父）約在一七八〇年代移渡來台定居於打狗灣內苓雅寮，至陳中和時已發展成極富經濟及社會影響力的望族。⁽⁴¹⁾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大高雄市地區，苓雅寮已相當發展。一九二六年的統計顯示，當年苓雅寮人口為四六七八人，佔高雄市郊區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九點四二，至一九三三年苓雅寮人口已居高雄市各町中（鹽埕町第一，旗后町第二）的第三位。⁽⁴²⁾黃金川〈偶作〉這首詩所描寫的苓洲風景「農人居比釣人多」正是這種社會變遷下的人文景觀。在黃金川的詩作中，確有史實的餘影在焉。

五、結論

從文化史的立場來看，台灣的歷史性格有兩個突出的層面：第一，台灣作為一個漢人社會，是中華文化在中原以外拓展的一個「實驗室」。已故的本省社會學家陳紹馨曾說：「在此『實驗室』裏，我們可以追尋一連串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從近代以

(40) 黃金川，《金川詩草》，頁一二〇。

(41) 參考：戴寶村，前引書（未刊稿本），第二章。

(42) 曾玉昆，〈高雄市史事探討〉（下）《高雄文獻》九、十期合刊（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一九八二年三月），頁六二。

前的階段，經現代化開始期，以至殖民地式現代化、自主性現代化的階段」。⁽⁴³⁾ 在這個觀點下，台灣的發展史可以被視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章，也是中華民族所蘊蓄深厚力量的發揮」。⁽⁴⁴⁾ 第二，台灣作為一個世界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十六世紀開始即已成為近代史上西歐各國爭取之基地，⁽⁴⁵⁾ 與西方文化之接觸甚早。在荷據時期，台灣已成為荷蘭人將中國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⁴⁶⁾ 明鄭時代鄭氏父子之興起，主要的憑藉力量就是當時的外洋通商貿易。⁽⁴⁷⁾ 戰後的經濟發展則被視為東亞的發展楷模。⁽⁴⁸⁾ 以上這兩種觀點各有所見，前者是從中原看台灣，後者是從世界看台灣，誠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高低近遠總不同」，各自代表了台灣史的兩個層面。

我們在這篇論文中所分析的黃金川的詩作，具體而微地展現台灣文化之作為中原文化的延續的這個層面。在日本統治下，從

(43) 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九），頁一～八，引文見頁六。

(44)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拓展與台灣的開發〉，收入：《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九），頁二十一～二十二。

(45) 參考：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頁三五～四四。

(46) 曹永和，〈荷蘭時期台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頁四五～六七，尤其是頁六六。

(47) 參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一），（I），頁七七。

(48) Peter Berger et al.,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Inc., 1988).

傳統台灣文學家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是血濃於水的故國之情。黃金川的業師施梅樵的〈秋日由高雄歸里諸友宴於平和樓〉詩云：「殷勤諮父老，誰尙憶神州」，⁽⁴⁹⁾很能描寫日據時代台灣詩人對文化祖國的情懷。黃金川的詩作，也在相當的程度內展現這種對中原文化的孺慕之情。其次，黃金川詩學的另一個面向，是她對農漁民生活的關懷，與她對天災地震中民生的疾苦所表達的同情。這種現實關懷，使黃金川的詩作，能超脫於香奩之外，不沾脂粉氣息，而展現某種寫實主義的取向，在台灣詩史上別具特色。

（附註：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與林啓屏先生討論切磋，尤其關於文學史背景及文學理論之諸多論點，承林先生提示，惠我良多，特此聲明誌謝）

(49) 施梅樵，〈鹿江集〉、〈五言詩部〉，〈秋日由高雄歸里諸友宴於平和樓〉，頁十八。

參考書目

一、中日文著作：

- 王詩琅，〈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收入：氏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台北：衆文圖書公司，一九八〇)。
- 《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一九六七)。
-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
- 《台灣日日報》(漢文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一版。
- 《台灣日日報》(夕刊)，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四版。
- 《台灣日日報》(漢文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夕刊)，第一版。八月二十七日，第四版。
-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八七)。
- 屈萬里，《詩經釋義》(台北：華岡出版部，一九六七)。
- 施梅樵，《鹿江集》(彰化：瑞明出版社，未著出版年)。
- 許俊雅，〈台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號。
- 曾玉昆，〈高雄市史事探討〉《高雄文獻》第九、十合刊。(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一九八二年三月)。
- 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九)。
-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拓展與台灣的開發〉，收入：《台灣早期

- 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九)。
- ，〈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 ，〈荷蘭時期台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一)。
- 黃水沛，〈大龍峒小志〉，刊於《台北文物》第二卷第二期。
- 《台北市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校，一九六二)卷十，〈雜錄〉〈文徵篇〉亦收此詩。
-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一九六三)。
- 黃金川，《金川詩草》(台北：陳啓清先生慈善基金會，一九九一)。
- 黃俊傑、古偉瀛，《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防災與救災措施的分析(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防災科技研究報告七九～〇五，計劃編號：NSC79-0414-P002-19B)。
- 廖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武陵出版社，一九八九)。
- 戴寶村，《苓仔寮至大港都—高雄陳家的歷史》(未刊稿本)。

二、英文著作：

Peter Berger et al.,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Inc., 1988).